

我国新时期资本形成问题分析^①

尚斌义¹, 黎涓²

(1.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2. 天津大学, 天津 300072)

摘要: 本文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为背景, 首先建立了兼顾积累与消费的二元目标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和两部门最优投资比例模型, 然后分析了我国资本形成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根据模型和分析的结果, 最终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资本形成; 最优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07(2000)04-0067-08

0 引言

在一般意义上, 资本是一种稀缺的生产性资源, 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投入要素之一。在发展经济学中, 人们通常综合地考察储蓄、投资和资本积累的过程, 分析储蓄如何转化为投资, 投资又如何形成一定的资本形式, 产生一定的生产能力, 因而也将投资过程称为“资本形成”。

发展经济学曾一直坚持“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1]。虽然后来发展经济学开始着重强调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而把资本形成看作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或约束条件之一, 但是, 从一系列含有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2-5]和人力资本模型^[4, 5]的假定方法和分析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模型都隐含着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即资本投入(包括实物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进的前提条件。因此,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资本形成都应该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本文试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期, 我国资本形成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模型

1.1 二元目标下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资本形成问题首先涉及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从弗兰克·拉姆齐^[6]开始, 西方经济学用优化的方法研究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又称最优经济增长问题)。自拉姆齐以来, 研究最优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献已多不胜数。在这些研究中, 一般都以总消费额最大化作为问题的目标函数。有的将效用函数设计成消费额的边际效用递减, 有的将效用或消费额全部贴现, 也有的把技术进步、资本折旧、人口增长引入模型, 还有的引入预期, 研究不确定性的情况^[7-9], 等等。

另一类研究积累与消费比例问题的方法是以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基础, 研究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家对积累与消费比例的选择与控制^[10]。一般认为, 出于“赶超”的需要,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往往要寻求投资的最高界限, 而相应地选取最低限度的消费数量。因此, 这些国家决策模型的目标函数最接近于资本积累最大化^[11]。

在讨论我国的积累—消费问题时, 把改革开放前模型的目标函数设定为资本积累最大化无疑是比较贴近实际的。但改革开放后的情况则应有

① 收稿日期: 2000-04-29; 修订日期: 1999-09-25.

作者简介: 尚斌义(1965-), 男, 山东滨州人, 经济学博士。

所变化.从 80 年代初开始,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确定经济建设应该走发展速度合适、经济效益好和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从那时起,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兼顾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两个方面,亦即积累与消费兼顾.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仍会走这条兼顾积累与消费的路子.从我们已经认识到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两个重要方面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以下我们据此设定模型的目标函数,并用优化的方法,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应如何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在一个封闭的国民经济系统中,总产出($Y(t)$)一部分用于消费($C(t)$),另一部分用于投资($I(t)$):

$$Y(t) = C(t) + I(t)$$

假设投资率为 σ ,则有

$$I(t) = \sigma Y(t), C(t) = (1 - \sigma)Y(t)$$

投资又被分作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两部分,假定投资中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为 α ,即

$$I'(t) = \alpha \sigma Y(t)$$

其中, $I'(t)$ 为 t 期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或称为净投资.若不计折旧, $I'(t)$ 即为实际增加的固定资本数.

再假定,消费分作即期消费和固定消费品两部分^①,分别以 $C_1(t)$ 和 $C_2(t)$ 表示.设固定消费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率为 β ,即

$$C_1(t) = \beta C(t), C_2(t) = (1 - \beta)C(t)$$

从而有

$$C_1(t) = \beta(1 - \sigma)Y(t),$$

$$C_2(t) = (1 - \beta)(1 - \sigma)Y(t)$$

假设生产函数为

$$Y(t) = F_1(K, L)$$

并假定投入的劳动总量 L 为常数,则总产出仅是资本存量 K 的函数

$$Y(t) = F(K)$$

设其满足 $F'(K) > 0, F''(K) < 0$.

不考虑资本折旧,资本存量与投资的关系为

$$\dot{K} = I'(t) = \alpha \sigma Y(t) = \alpha \sigma F(K)$$

也不考虑固定消费品折旧,则固定消费品存

量(设为 V_1)与 K 的关系为

$$\dot{V}_1 = C_1(t) = \beta C(t)$$

$$= \beta(1 - \sigma)Y(t)$$

$$= \beta(1 - \sigma)F(K)$$

即期消费(设为 V_2)与 K 的关系为

$$V_2 = (1 - \beta)(1 - \sigma)F(K)$$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国新时期积累与消费兼顾,所以假定决策者的效用函数为

$$U = U_1(K, V_1, V_2)$$

在实际生活中,居民会按照边际效用相等的原则,自行安排收入中用于购买固定消费品与用于即期消费的比例,所以 β 值可不作为一个决策变量.而由于 $\dot{V}_1/V_2 = \beta/(1 - \beta)$,若 β 不变,且 V_1 的初值已定,则 V_1 与 V_2 之间有固定的函数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即期消费对于效用函数的影响可以通过固定消费品的变化反映出来.所以,可以把上式改写为

$$U = U(K, V_1)$$

假定这个效用函数满足 $U_K > 0, U_{K'} < 0$ 和 $U_{V_1} > 0, U_{V_1'} < 0$.

问题就是:已知开始时 $K(0)$ 和 $V_1(0)$ 的值,要在 T 时间后,让它们各自达到 $K(T)$ 和 $V_1(T)$,并使得累计的效用值最大.不考虑效用折旧,问题的数学模型为

$$\max_{0 \leq \sigma(t) \leq 1} J = \int_0^T U(K, V_1) dt$$

$$\text{s. t. } \dot{K} = \alpha \sigma F(K)$$

$$\dot{V}_1 = \beta(1 - \sigma)F(K)$$

$$K(0), V_1(0), K(T), V_1(T) \text{ 已知}$$

这属于固定端点的极值问题.假定 α, β 已定,决策变量为 σ ,用极大值原理解上述模型(求解过程略),可以得出最优策略为

$$\text{当 } \lambda_1 \alpha > \lambda_2 \beta \text{ 时, } \sigma = 1;$$

$$\text{当 } \lambda_1 \alpha < \lambda_2 \beta \text{ 时, } \sigma = 0;$$

$$\text{当 } \lambda_1 \alpha = \lambda_2 \beta \text{ 时,}$$

$$\alpha \frac{\partial U}{\partial K} + \lambda_2 \alpha \beta F(K) = \beta \frac{\partial U}{\partial V_1} \quad (1)$$

实际经济中,由于存货增加一般只占总投资的一小部分,所以可假定 $\alpha = 1$,于是(1)变为

①. 这里,我们把消费品分作两类,一类是当期消费掉的,计入即期消费;另一类,包括住宅、汽车、家具以及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划入固定消费品一类.这里的“固定消费品”是一个比统计上的“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更宽泛的概念.

$$\frac{\partial U}{\partial K} + \lambda_2 \beta F'(K) = \beta \frac{\partial U}{\partial V_1}$$

上式中, $\lambda_2 \beta$ 为消费对于效用函数的影子价格^①, 表示当消费每增加一个单位时, 效用增加 $\lambda_2 \beta$ 个单位, $\lambda_2 \beta > 0$. 又因为 $\frac{\partial U}{\partial K} > 0$, $\frac{\partial U}{\partial V_1} > 0$ 和 $F'(K) > 0$, 且 $\beta \in [0, 1]$, 所以应有

$$\frac{\partial U}{\partial K} \leq \frac{\partial U}{\partial V_1}$$

即 σ 的选取应使得投资的边际效用小于消费的边际效用. 由于是在 $\lambda_1 \alpha = \lambda_2 \beta$ 时, 即投资的影子价格等于消费的影子价格时得出的上述结论, 所以直观地说, 就是在消费与投资“同等”重要的情况下, “投资应优先于消费”.

总之, 当决策者的效用函数为既包括消费, 也包括积累的二元目标函数时, 投资策略应如下设定:

第一, 当投资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异常重要时, 应选取最大可能的投资率.

第二, 当消费对于社会异常重要时, 应选择最小的投资率.

第三, 当投资与消费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同等”重要时, 应采取“积累优先”的投资—消费策略.

1.2 两部门投资的大道模型: 最优投资比例

资本形成的另一个问题是投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如何分配, 即投资结构问题. 这里, 构造一个两部门投资的大道模型, 来讨论投资结构问题.

把国民经济的生产部门分成投资品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两大部门, 用 K_1 表示投资品生产部门的资本存量, 它反映全社会的投资品生产能力. 用 K_2 表示消费品生产部门的资本存量, 它反映全社会的消费品生产能力. L 表示投入的劳动总量. 国民经济的总产出为

$$Y(t) = F_1(K_1, K_2, L)$$

假定 L 为常数, 则总产出

$$Y(t) = F(K_1, K_2),$$

假定 $F_{K_1} > 0$, $F_{K_1} < 0$ 和 $F_{K_2} > 0$, $F_{K_2} < 0$ 成立.

设投资率为 σ , 并设投资品部门的比例为 $\alpha(t)$, 则用于投资品部门的投资流量 $I_1(t)$ 为

$$I_1(t) = \alpha(t)\sigma Y(t)$$

余下的投资用于消费品生产部门, 用于消费品部门的投资流量 $I_2(t)$ 为

$$I_2(t) = (1 - \alpha(t))\sigma Y(t)$$

不考虑固定资本折旧, 则有

$$\dot{K}_1 = \alpha(t)\sigma Y(t)$$

$$\dot{K}_2 = (1 - \alpha(t))\sigma Y(t)$$

假定开始时两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分别为 $K_1(0)$ 和 $K_2(0)$. 我们希望在 T 时间后, 让它们各自达到 $K_1(T)$ 和 $K_2(T)$, 同时使得累计的总产出量最大.

本问题的数学模型为

$$\max_{0 \leq \alpha(t) \leq 1} J = \int_0^T F(K_1, K_2) dt$$

$$\text{s. t. } \dot{K}_1 = \alpha(t)\sigma F(K_1, K_2)$$

$$\dot{K}_2 = (1 - \alpha(t))\sigma F(K_1, K_2)$$

$$K_1(0), K_2(0), K_1(T), K_2(T) \text{ 已知}$$

求解上述固定端点的极值问题可得(求解过程略^[12]);

当 $\lambda_1 > \lambda_2$ 时, $\alpha(t) = 1$;

当 $\lambda_1 < \lambda_2$ 时, $\alpha(t) = 0$;

当 $\lambda_1 = \lambda_2$ 时, 有

$$\frac{\partial F(K_1, K_2)}{\partial K_1} = \frac{\partial F(K_1, K_2)}{\partial K_2}$$

即两部门投资应使得投资的边际产出相等.

若生产函数为

$$F(K_1, K_2) = AK_1^a K_2^b$$

则可以解出, 当 $\lambda_1 = \lambda_2$ 时, $\alpha = a/(a+b)$, 即最优投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为常数.

于是可以得出两部门最优投资比例的投资策略为:

第一, 当投资品生产部门与消费品生产部门的资本存量成合适比例时, 投资品生产部门占总投资的比例为 $\alpha = a/(a+b)$; 消费品生产部门占总投资的比例为 $1 - \alpha = b/(a+b)$.

第二, 当投资品生产部门资本存量太小, 或投资品相对短缺时, 可将全部投资用于投资品生产部门建设.

第三, 当消费品生产部门资本存量太小, 或消费品相对短缺时, 可将全部投资用于消费品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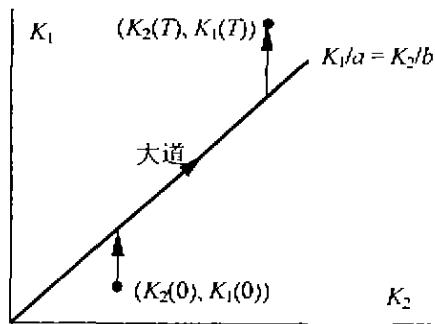
① 准确地说应是固定消费品的影子价格.

部门建设。

可以把第一种情况称为按比例均衡增长,而把第二、三种情况称为经济调整。

如果规划的时间 T 足够大,可以用图 1 来表示经济调整和均衡增长的情况。

投资品部门资本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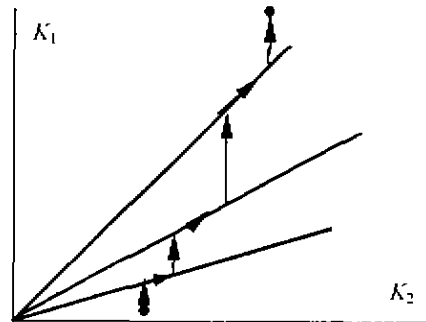
消费品部门资本存量

图 1 两部门投资策略的大道模型

投资品部门与消费品部门的比例关系 (a/b 的值) 可由制造业产值中轻重比例近似看出。由表 1 可以看出, 在世界范围, 愈是发达国家, 重工业产值的比例越大, 代表其投资品部门的资本存量比例越大。所以, 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不仅表现

进一步, 可以直观地表示出国民经济多阶段调整过程。假定生产函数发生较大的变化, 即 a/b 的值发生阶段性变化, 那么国民经济的长期最优增长应该是在不同的“大道”上运行的过程, 如图 2。

投资品部门资本存量



消费品部门资本存量

图 2 国民经济多阶段调整过程

为投资品部门和消费品部门资本存量的绝对值的共同提高, 同时也表现为投资品部门占总资本存量比例的增大。因此, 图 2 所表示的最优增长轨迹实际是一个国家由欠发达走向发达的发展过程。

表 1 中国与世界制造业产值中轻重结构比较 (%)

制造业部门	世界总计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中 国		
	1990 年	1995 年	1990 年	1995 年	1990 年	1995 年	1952 年	1978 年	1994 年
轻型制造业	32.7	31.8	30.5	29.3	44.2	42.2	64.5	43.1	47.1
重型制造业	67.3	68.2	69.5	70.7	55.8	57.8	35.5	56.9	52.9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 1997》,第 875 页。《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5 年各卷。

注:我国的重工业中还包采掘业。

投资品部门资本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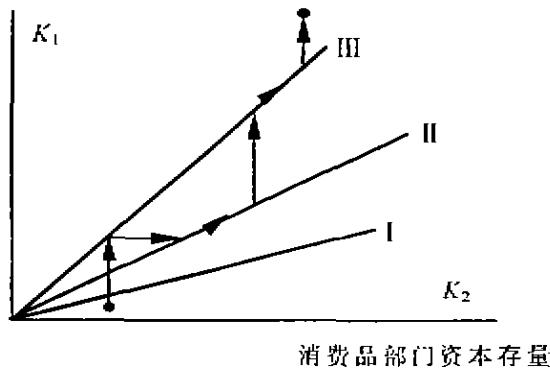


图 3 重工业优先发展及后来的经济调整过程

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历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及后来的调整过程可以用图 3 表示。图中, I、II、III 分别代表不同的最优增长大道, 国家从总资本存量和投资品部门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都较低开始起步, 先采用投资品部门优先发展的战略, 越过大道 I、II, 直接达到大道 III 的水平。之后, 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或扩大工业品市场的要求, 国民经济不得不回到一条适宜的大道, 比如大道 I, 在这条大道上均衡增长一段时间后, 再上升至大道 III。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吉利斯等在论述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理论时提出了“突击式的发展路线”

和“稳定的平衡发展路线”的说法^[12],可以认为,本模型及其推论,给出了吉利斯上述说法的模型说明。

2 我国资本形成的新形势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在我国 1953-1995 年的 43 年长周期中,经济增长中 86.73% 靠要素的投入,其中资本的投入贡献占 68.52%,劳动投入贡献占 18.21%,生产率的贡献占 13.27%^[13]。虽然资本投入的效益不太高,但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由于我国尚未达到只靠技术进步就能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时期,所以在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由投入型向效益型转变中,资本投入的作用仍不可小视。因为不仅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需要投资,资本投入本身的贡献也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所必需。另外,缓解因效率提高而加剧的就业压力也需要加大资本投入。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有比发达国家高得多的投资率^[14],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也是明显的^[15]。

有专家预测,要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我国未来 50 年的整体投资应保持在年投资率 25%-30% 左右的高水平上^[16]。但是,近年来,虽然我国的投资率总体上仍保持较高水平,但国民经济中存在的资本形成的一些旧问题不但未得到解决,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2.1 资本形成的增速呈递减趋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进行经济调整,力图摆脱以积累为中心的经济格局,我国积累率的增长速度从“六五”时期开始回落,这首先证明我国改变以前过分强调高积累的经济调整已经长期见效,有利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积累资本的使用结构上,从“六五”时期开始,生产性积累的水平降低,非生产性积累水平

提高^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应当开始注意到问题的另一面,即要防止积累率的过分下降和生产性积累比例的过度减小,否则,不仅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受影响,还会因为固定资本形成速度下降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后劲。

我国从 1993 年开始实行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以消除经济过热,治理混乱的经济秩序,至 1996 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然而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国内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1997 年开始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失业增加、效益下降的情况日益严重。受有效需求不足和其他因素的制约,投资增速连续六年下降,由 1993 年 61.8%,1994 年 30.4%,1995 年 17.5%,1996 年 14.8%,1997 年 8.8%,1998 年 14.1%,一直下降到 1999 年 5.2%^②。当然,这一次投资增速的下降明显带有宏观经济周期性质。但是,在这一轮周期之后,我国是否还能长期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速度,仍是一个未知的问题。

2.2 投资结构“轻农重工”的倾向尚未解决

建国后,为加速工业化进程,我国通过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城乡隔离制度,强制性压低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和农产品价格,以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提取农业剩余进行工业化积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和国家调整了农村和农业政策的指导思想,开始实施富民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曾决定在三、五年内,把政府的农业投资占整个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由 11% 左右提高到 18% 左右。然而实际上,只有 1979 年的农业投资有所增长,由 11% 增加到 13.7%。1980 年以后,农业形势不断好转,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也逐年减少^[17]。至 90 年代,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只占到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 1%—1.5% 左右,更新改造投资只占全国的 0.6%—1% 左右^③。而相比之下,至 90 年代末期,我国乡村人口仍占到全国人口的 70% 以上,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农民也仍占到全部就业人口的 70% 以上^④,在全国居民总消费

① 见《中国经济年鉴 1993》,北京:中国经济年鉴社,第 43 页。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8》,《199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8》第 196 页和第 212 页数据计算。

④ 《中国统计年鉴 1998》,第 28 页。

中,农民仅占19.7%(1997年数字)^[1],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2.73倍。对农业的投入不足,不仅导致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下,也因此影响了农村市场的开发,成为导致我国过早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2.3 出现“重重轻轻”、“轻投资品生产,重消费品生产”的苗头

在工业内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几次进行结构调整,改变“重重轻轻”的严重比例失调

问题,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工业生产的内部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消费品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重重轻轻”的局面有了根本的改观。然而,随着“重重轻轻”局面的逐步改变,也出现了新的“轻重重重”和“轻投资品生产,重消费品生产”的苗头。由表2看出,1978年以后我国部分家用电器和食品产量增长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几万倍的同时,部分投资品产量却增长缓慢。

表2 改革开放前后我国部分工业产品产量比较

	消费品				投资品			
	啤酒	家用电冰箱	家用洗衣机	彩色电视机	交流电动机	金属切削机床	载重汽车	拖拉机
1978/1952年	8 ^[1]	17.5 ^[2]	1 ^[3]	1.31 ^[4]	49.9	13.4	15.5 ^[5]	16.0 ^[2]
1997/1978年	47.2	373.0	31362.0	7135.1	1.6	1.0	6.0	0.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465~472页有关数据计算。

注:①②③④⑤:以1978年的产量比1952—1978年间该产品在我国出现第一年的产量。

投资品生产行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发展滞后已开始成为现阶段我国产业发展的突出弱点。据有关部门对钢铁、石化、电力等15个行业的调查,我国企业的生产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一般为五到十年,关键技术差距更大。我国目前国民经济和高技术所需装备的2/3要依赖进口。在事关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中,我国重大装备和关键技术依赖进口的程度正不断加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国的轿车生产企业至今还不能拥有整车开发技术,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国外几家大企业手里。

装备工业发展的迟缓,不仅使国内对设备的需求漏出到国外,不能拉动宏观总需求,而且不利于我国科技供给能力的提高。这无疑会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和发展的后劲。

“轻投资品生产,重消费品生产”使国民经济总体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能力受到限制的同时,也造成了消费品行业出现大范围的生产能力过剩。报载^[6]，“八五”期间,我国工业产成品库存量以30%的幅度增长,超过同期工业生产增长幅度至少10个百分点。棉纺、毛纺、彩电、电冰箱、洗

衣机等产品的闲置生产能力均在1/3到1/2的水平,自行车、手表、酿酒、制革、造纸等行业剩余生产能力都在40%以上,影碟机剩余生产能力更高达60%。另据报道^[7],2000年我国空调市场的容量为700万台,而全国空调厂家年生产能力能达到2200万台。“轻投资品生产,重消费品生产”的倾向成为加速市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另一重要原因。

2.4 国家对社会投资的调控能力减弱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国家直接掌握和有效调控的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只有15%左右^[8]。由于其他有效的调控手段、措施尚未健全,国家对全社会投资的调控能力大大降低,从而使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减弱。1998—1999年,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措施,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但效果很不理想,物价持续走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不止,宏观调控目标迟迟未能实现。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1) 充分认识资本形成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

[1] 中国统计年鉴,第28页。

[2] 见《经济参考报》,1999年2月10日,第7版。

[3] 见《经济日报》,2000年4月4日,第2版。

重要性,确立适宜的投资率和投资结构目标

分析结果告诉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我们仍要十分重视资本积累。所以,应充分认识资本形成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把投资增长速度放在重要位置上加以考虑。国民经济在整体上要保有适度的,各方面可承受的投资规模和投资增长水平。实际操作中,应根据各个时期投资的可行性,努力促使投资达到较高水平。要在重视依靠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事求是地看到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对于资本投入仍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促进经济增长还要坚持“一靠提高效率,二靠加大投入”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工业结构不是“重重轻轻”,而是“轻重重轻”。因此,不能再一味地强调“轻重重轻”,而应寻找我国经济均衡增长的新的比例关系,使国民经济驶上结构适宜的、新的“大道”,预防出现“轻重重轻”的新问题,对于防止出现“消费早熟”和有效需求不足,保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很有必要。

(2) 通过深化改革,创新资本形成制度

要把建立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国家能够实施有效调控的投资体制为目标,根据我国改革的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资本形成制度。

(3) 保持有效的国家直接投资,大力支持鼓励社会投资

应继续有效地进行国家直接投资(当然不能再搞重复建设、盲目铺摊子)。国家不仅可以也应该在国民经济的“瓶颈”部门、公共部门和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部门直接投资建设,还应该在社会资本难以涉足的投资周期长、起步资金数量要求高,但又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后劲的部门、行业直接投资,建立国有企业。应促进国有企业与其他经济成分企业的公平竞争,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

鼓励社会投资应是一项长期策略。应当运用税收、利率等政策工具鼓励投资,利用产业政策引导投资的方向。应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依法保护各类投资者的利益。要坚定地按照邓小平同志设计的“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的模式和

“三个有利于”的原则,调动和发挥各种积极因素,扩大投资,发展经济。

(4) 实施“低元推进”战略

这里所谓“低元推进”,就是指通过加大对经济结构中相对落后的部门、地区、产业和社会阶层的投入,使经济由相对不平衡发展走向相对平衡发展,以促进国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以“高元拉动”为主,即采取现代部门优先发展以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方法。这由“重工业优先发展”和“工农业剪刀差”的做法可见一斑。然而,随着情况的变化,继续依靠“高元拉动”促进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制约。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使工业品的农村市场难以开发而限制了工业部门的持续扩张就是一个例证。

根据两部门投资比例模型的结论,当不均衡增长已受到制约时,应改变部门投入的结构,把国民经济向按比例均衡增长的“大道”方向调整。所以,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发展策略中,应重视“低元”的作用,实行“低元推进”与“高元拉动”并举,促进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按照我国目前的情况,相对于工业,农业就是低元;相对于城市,农村就是低元;相对于东部,西部就是低元^①。所以,当前我国实行“低元推进”战略应着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产业结构上,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在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农业仍将担负着为其他产业的扩张和社会的发展贡献产品、市场、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任务。但是,今后发挥农业贡献的方法不能再是“竭泽而渔”,而应是“放水养鱼”。对农业的投入不足,是导致农村市场得不到开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得不到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率,不仅可以提高农民收入,有助于开拓农村市场,还可以从土地上转移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而可以有效地抑制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出现的高工资水平,预防消费早熟,利于经济发展。另外,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可以使农业对其他产业和城市化提供的资本积累贡献更大。

第二,在地区结构上,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

① 这里所谓“低元”、“高元”,是就经济发展的快慢和先后次序而言的,只为说来方便,丝毫没有好坏、优劣和社会等级高低的意味。

投入。

第三,在社会阶层结构上,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实施“低重心”全面发展教育的战

略,力争早日实现教育的超前发展。

第四,在部门结构上,全面加快城市化的进程。

参 考 文 献:

- [1]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37
- [2] Arrow K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29:155-173
- [3] 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1002-1037
- [4] Uzawa Hirofumi. Optimum technical change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65, 6:12-31
- [5] 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2): S71-S102
- [6] Ramsey F P.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J]. *Economic Journal*, 1928, 38:543-559. Reprinted in Stiglitz Joseph E, Uzawa Hirofumi. *Readings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M]. Cambridge: MIT Press, 1969
- [7] Romer P M. *Advanced Macroeconomics*[M].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6
- [8] [美]奥利维尔·琼·布兰查德,斯坦利·费希尔,宏观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64,101,171,302
- [9] Obstfeld Maurice, Rogoff, Kenneth.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6
- [10] [波兰]奥斯卡·兰格,经济控制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11] 徐真庆,李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68
- [12] [美]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89
- [13] 李京文,钟学义,中国生产率分析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01
- [14] 李成勋,1996-205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460-462
- [15] 世界经济年鉴社,世界经济年鉴1997[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433
- [16] 同[14],458-462
- [17] 董辅弼,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44
- [18] 武少俊,国家发展计划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25
- [19] 张金水,确定性动态系统经济控制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326-327

An analysis on the capital 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y in new stage

SHANG Bin-yi¹, LI Juan²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new stage in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paper set up two models, optimal economy growth under two goals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optimal investment ratio, then analyses the new situation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China's economy. Based on the models and analyses, some economic policies are given.

Key words: capital formation;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economy development; economic policy